

第一章 媒介与儿童研究

起源于西方的大众媒介与儿童研究有近 80 年的历史。中国自 80 年代电视等大众媒介普及以来，也开始关注并进行了有关研究。本章将回顾和讨论主要的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

第一节 研究回顾

一、研究起源

媒介与儿童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 20 年代初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

20 年代初，在广播与电视未普及之前，看电影是美国家庭中最普遍的休闲活动。1922 年以前还未有确定的票房数字，但就在 1922 年，每周进入电影院的人数已达 4000 万。20 年代末，达 9000 万。1929 年看电影的观众中有约 4000 万青少年，其中大约 1700 万是 14 岁以下的儿童。^①而约 3/4 的电影主题是关于爱情、犯罪和性。一个深深吸引儿童并能使儿童迅速卷入的新媒介，加上媒介中大量存在着的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已足

^① Shearon A. lowery & Melvin L. De Fleur 著，王嵩音译：《传播研究的里程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第 49 页。

以构成社会对电影的普遍忧虑和恐惧。至 20 年代中期，电影已面临来自报纸、杂志的广泛批评和家长、学校的舆论压力。电影到底会给美国的儿童带来什么？儿童观看暴力内容会有什么后果？电影是否影响儿童学习符合社会规范的观念和行为？这些问题促使社会科学家开始电影与儿童的研究。

20~30 年代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佩恩基金会（民间慈善机构）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1929~1932 年）。1933 年，该基金会的研究成果以《电影和儿童研究摘要》为题公开发表，其中包括《电影和儿童的社会态度》、《电影和道德标准》、《电影内容分析》、《电影与青少年犯罪》等 13 项专题，由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共同完成。其研究结果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电影内容的探讨，即电影到底向青少年表现了什么内容，研究者总共分析了 1500 部电影；另一类结果是关于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包括对社会态度、情绪、道德、行为、健康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指出，电影确实改变了青少年的社会态度、道德观念或行为（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对电影的批评与忧虑值得社会重视。

20 年代，统计学刚刚成为社会行为科学的研究工具。佩恩基金会研究大量采用了问卷调查、实验、内容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例如，鲁恩·C. 彼得森和 L.L. 瑟斯顿的关于电影与儿童社会态度的实验研究。其研究步骤如下：（1）依据一定原则（如近期电影、校方接受的电影和对研究的某一问题有明显态度的电影）从上百部影片中选择了 13 部电影作为实验材料；（2）使用专门设计的等级量表测量儿童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态度；（3）请调查对象看一部入选的电影；（4）看完电影的第二天，对儿童进行第二次测试，以发现儿童态度是否变化；（5）两个半月至 18 个月之后，对儿童进行第三次测试，以检验电影的影响是否还存在。芝加哥附近的约 4000 名初、高中学生参加了实验。实验表明，电影可以改变儿童的态度，有时甚至可以引起显著的变化。比如，儿童在

看了一部颂扬中国人的电影后，比在看电影前更为肯定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者还通过其他实验得出结论：一部电影就能改变儿童对战争、赌博和惩治罪犯的态度。当然，研究者也使用了自传体日记、自然观察、访谈等定质研究方法。

应该指出，受当时传播理论发展和研究技术的限制，佩恩基金会的电影与儿童研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电影与儿童社会态度研究未使用控制组等。但是，佩恩基金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媒介与儿童研究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佩恩基金会研究所探讨的各种议题成为以后媒介与儿童研究的主题。媒介提供新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态度、提供新的道德标准、刺激情绪、提供模仿范本、影响青少年对事物的理解、干扰睡眠等议题，到现在还是媒介与儿童研究的主题。不仅如此，以后的研究也同佩恩基金会研究一样，对媒介的负面影响倍加关注。在 20 年代以后，几乎每一种媒介普及，教育者、家长、社会科学研究者乃至全社会都会提出几乎相同的问题：这种媒介会对儿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教育已卷入新媒介的儿童？媒介对孩子会不会产生“坏影响”？如美国家庭媒介教育专家 Wendy Iazarus 等人所指出的，几乎每隔 10 年，人们就向媒体进行一次“诘难”：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我应该带孩子去看电影吗？

20 年代：为什么我的孩子比我更熟悉收音机的节目？

30 年代：收音机里的暴力节目是不是太多了？

40 年代：卡通漫画会对我的孩子有坏影响吗？

50 年代：电视对我的孩子究竟有好影响还是坏影响？

60 年代：我的孩子从摇滚乐里学到了什么？

70 年代：电视节目怎么有这么多暴力镜头？

80 年代：我的孩子是不是玩电子游戏玩得太多了？

90 年代：我的孩子使用计算机了，上了网，他会变成什么

样呢？^①

美国媒介与儿童研究专家 Ellen Wartella 和 Byron Reeves 在分析了 1900 ~ 1960 年媒介与儿童研究之后发现，在每一个时代（电影：1904 ~ 1939 年；广播：1930 ~ 1940 年；电视：1949 ~ 目前），媒介与儿童研究都集中在媒介使用模型、媒介对儿童身体和情感的消极效果和媒介对儿童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由于早期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建立好一个固定的‘议事日程’所以每个时代的研究都是相似的”。^②在现代社会，各种新兴大众媒介不断出现，从电视、录音机、录像机、有线电视到 CD、计算机、只读光盘和互联网，电影已不再具有往日的重要地位。但电影与青少年的研究却开启了一系列媒介与儿童的研究领域。

第二，佩恩基金会研究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在佩恩基金会研究的年代，最有影响的传播效果学说是“魔弹论”，研究者们也试图发现电影直接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社会行为等方面的证据，因为促使佩恩基金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信电影已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不良影响（电影效果）是青少年对电影刺激的直接反应结果。但是，当 1933 年佩恩基金会系列报告公布时，人们发现“魔弹论”难以解释电影的影响。佩恩基金会系列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是：观看同样的影片，不同的儿童会受到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因儿童的年龄、性别、倾向、理解力、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以及父母影响的不同而不同。不难看出，这个结论更近似于现代的在“影响不一

① <http://www.childrenspartnership.org/contents.html>。

② Ellen Wartella and Byron Reeves, “Historical Trends in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the Media, 1900 ~ 1960”,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6, 1985, p169。

论”指导下的电视与儿童研究。也就是说，当研究者探讨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媒介传播的内容，也必须要考虑儿童接收媒介内容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环境，关注儿童为何会注意、如何理解以及记忆了何种信息，否则就不能得出关于“影响”的结论。应该说，从佩恩基金会研究开始，提出了“影响不一”的问题，这就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提供了更为接近实际情况的分析框架。

第三，佩恩基金会研究为媒介与儿童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在佩恩基金会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中，研究者尽可能尝试了当时能够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内容分析、票房记录分析（文献分析）、控制实验（包括记忆测量、态度测量、情绪测量、道德测量等）、问卷调查、自然环境实验、个案访谈、个人生活史调查以及自传式记录法等。其中的内容分析、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采用了刚刚在社会科学应用的统计学原理，使电影与儿童研究带有显著的量化特征。整个研究也不排斥定质研究方法，研究者从自传体记录等定质材料中获得了大量的关于电影对青少年日常生活影响的信息。所有的方法都带有强烈的实证、科学和探索的色彩。尽管有些方法并不完善，但是，在佩恩基金会研究的影响下，媒介与儿童研究领域形成了实证方法主流。以后，大多数有影响的研究均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如《诱惑纯洁的心灵》（美国沃善等 50 年代对儿童漫画书的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和临床个案心理测验等方法、《我们生活中的电视》（美国施拉姆等 60 年代对电视影响的研究）采用了控制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等。

二、国外主要研究结论

媒介与儿童研究大都集中在媒介使用模型、媒介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和媒介对儿童的社会认知、态度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三个方面，分述如下：

1. 媒介使用模型

儿童的媒介使用模型研究不仅是为了探讨儿童如何使用媒介，更是为了考察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当一些研究指出“电视扩大了儿童的知识范围”或“电影导致儿童侵犯性行为”的时候，研究的角度是指向电视影响了儿童什么，认定儿童是媒介的被动接受者。美国早期研究儿童与电视的学者施拉姆则从相反的角度来研究儿童和电视效果问题，在他的论著《我国儿童生活中的电视》（*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中，提出了“儿童是电视的使用者（USER）”^①的思想。“使用者”思想源于传播学中的个人差异理论和社会分化理论。从这些理论出发，施拉姆认为，儿童不是孤立、被动的个体，每一个儿童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固有的价值观及其理性和情感特征，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同时，每一个儿童也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即根据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年龄等而划分的社会类别的一员。这些关系将影响着儿童与电视的接触、影响着儿童对电视内容的理解和将采取的相应的行为，最终影响着电视效果。因此，他特别重视儿童媒介使用模型研究，就儿童使用媒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儿童是何时和如何介入媒介的？儿童使用媒介的时间、频度如何？儿童的媒介偏好是什么？儿童为什么需要媒介？在不同的年龄段，儿童是怎样认识媒介的？什么因素（如性别、年龄、智商、家庭背景、个人兴趣、社会关系等）影响儿童对媒介的选择？儿童如何使用不同的媒介？儿童使用媒介做什么或者说媒介对儿童有什么用？这些问题构成了以后研究儿童媒介使用模型的线索。

施拉姆等学者在 1958 ~ 1960 年 3 年间进行了 11 项研究，一共访问了 5991 个小学生和 1958 位父母。其主要结论是：（1）儿

① W. Shramm, J. Lyle & W. B. Parker, 1961,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童从两岁开始看电视, 3岁就可成为固定的电视观众, 能指认其所喜爱的电视明星等。(2) 年龄是决定看电视时间的重要因素。11岁到13岁是看电视最多的年龄层。(3) 智商影响儿童看电视的时间。年龄较小的儿童, 智商较高者看电视较多; 但到了10~13岁, 呈相反的情形, 智商较高者看电视时间较短, 因为电视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新鲜的刺激, 他们转而寻求印刷媒体及学校活动。(4) 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儿童较少看电视。(5) 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相比, 工人家庭中的儿童花较多时间看电视。(6) 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或同伴关系) 不好的儿童, 看电视较多, 以看电视来取代社会交活动。(7) 社会规范影响儿童的媒介接触。中产阶级生活规范如主动、自我进步等精神促使这个阶层的儿童偏好印刷媒介和教育性电视节目。(8) 儿童年龄较小时, 最喜欢看儿童节目。稍大, 就喜欢看犯罪片和情境喜剧。青少年喜欢看流行音乐节目。儿童也很早就开始看成人片, 如西部片等。小学六年级学生看电视时间中的79%是用于看成人电视节目, 约是儿童节目时间的5倍。(9) 性别、年龄、智商影响儿童电视节目内容的选择。(10) 儿童非常喜欢电视, 认为是生活中不能失去的东西。只有较高年級的并且智商较高的青少年才会对电视有所批评。(11) 看电视可以满足儿童的娱乐需要和获得生活资讯的需要。电视也可以增加儿童的社交活动, 如邀请伙伴一起看电视或谈论关于电视的话题等。^①

80年代至90年代, 许多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使用模型问题, 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 儿童在使用媒介时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如何定义儿童的主动性。美国著名儿童与电视研究者 ELLEN Wartella 所做的文献分析认为, 儿童对电视节目比较逆来

^① W. Shramm, J. Lyle & W. B. Parker, 1961,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9~174.

顺受，很少批评。^① 这个结论与以往的“儿童采用互动式的收视行为”的结论有所不同。（2）更多的研究文献确认了儿童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社会关系等是影响儿童媒介接触的重要变量。也有文献提出新的变量，如儿童的宗教信仰。一项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的变量后，儿童是否有宗教信仰与儿童的电视接触时间、内容偏好有显著相关。经常去教堂的儿童比不经常去教堂的儿童看电视时间更少，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儿童更关心媒介中有关社会问题或政治、环境保护以及道德问题的内容。^②（3）通过跨文化研究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使用媒介的共同点和差异。如一项研究分析了阿根廷、台湾、南韩、中国大陆、美国 5 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在家庭中的使用，指出在儿童观看时间、家庭对电视的管理、电视观看与家庭传播的关系、使用教育性电视节目等方面深受当地文化、经济背景的影响。^③（4）90 年代以前的媒介使用模型研究重点探讨了电视对阅读印刷媒体的影响，收看电视与收听收音机的关系以及电子游戏与电视的互动性比较等。1994 年前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促使研究者关注新媒介技术对儿童使用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影响。1998 年在儿童与电视世界峰会上，不少研究者指出，1995 年以来，儿童、青少年的兴趣开始从电视产品转向交互式产品，

① Ellen Wartella, “Children as an Audience”, 《台湾新闻学研究》, 第 43 集, p39 ~ 54。

② Leslie J. Francis & Harry M. Gibson, “The Influence of Age, Sex, Social Class and Religion on Television Viewing Time and Programme Preferences Among 11 ~ 15 Years Old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levision*, Vol. 19, No. 1, 1993, p25 ~ 35。

③ James Shanahan & Michael Morgan, “Adolescents, Families and Television in Five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Cross - 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levision*, Vol. 18, No. 1, 1992, p35 ~ 53。

他们增加了接触新媒介的时间，相应就会减少了花费在传统的学习材料和娱乐消遣上的时间。我们应该对儿童观众的立场态度、智力水平和媒介需求重新进行评估。^①

2. 媒介使用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心理发展的研究主要讨论在电视等媒体介入儿童生活后，儿童在认知、语言、智力、情绪等方面发展与以前有何不同。其基本研究模式是进行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比较。

●语言。施拉姆的早期研究发现，一年级看电视孩子的词汇测试分数比不看电视的孩子要高出许多，并有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到六年级便消失了。作者认为是成熟原则在起作用（*principle of maturation*），即当儿童发展至某一阶段时，电视便不再具有新经验的功能。儿童将对以事实为取向的媒介内容更感兴趣^②。另一项研究分析了电视作为语言示范的作用。研究假设儿童看电视由于缺少反馈而增加了语言能力。但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后，却发现儿童的电视接触与语言发展有显著的相反关系。虽然研究不能提供确定的因果关系，但作者提供了一些解释，比如电视可能经常播出不标准的、不够优雅的语言，或者相反，可能是较低语言水平的儿童更喜欢看电视，结果限制了儿童的语言发展。^③

●情绪。早期研究文献中包含大量的关于儿童情绪的研究。如佩恩基金会的关于情绪支配（*emotional possession*）的儿童自传

① *Final Report on The Second World Summit on Television for children*, 1998, p71 ~ 86。

② Wilbur Schramm, Jack Lyle, and Edwin B. Parker,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98。

③ Selnow, G. W. and Bettinghaus, E. P. "Television Exposur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Jouranal of Broadcasting*, 1982, 26 (1), p467 ~ 479。

研究发现,电影可以激发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到极限,以致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① 自传研究还说明儿童容易迷恋电影明星。对日常行为的影响包括对黑夜的恐惧反应,如不敢走进黑暗房间等。施拉姆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电视节目惊吓过,尤其是儿童认同的人或动物遭受伤害时。^② 研究也争论媒介对儿童情绪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影响。

●创造性。以往的研究文献说明儿童的创造性不受短期干预的影响。在一项关于电视与收音机对儿童创造性的不同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将 32 个三年级学生和 32 个六年级学生分成电视组和收音机组,分别叙述了一个故事,然后根据儿童想象的流畅性、灵活性和原创性进行评分,在控制有关因素后发现,电视组与收音机组的儿童的创造性或想象力没有显著区别。因此,研究建议应该考虑进行长期效果的研究,以确认是否不同媒介使用影响了儿童的创造性。^③

●电视对阅读的影响。主要包括电视对阅读数量、阅读偏好以及对阅读理解水平的影响。研究虽然较多,但并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一项研究发现看大量电视节目的学生同时也读更多的书,但对书籍的理解水平较低。这类学生喜欢的阅读材料通常是

① Shearon A. Lowery, Melvin L. DeFleur, 1988,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王嵩音译,《传播研究的里程碑》,1993,台湾远流出版社,65~66页。

② Wilbur Schramm, Jack Lyle, and Edwin B. Parker,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③ Runco, M. A. and Pezdek, K. "The Effect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on Children's Creativ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4, 11 (1), p109 ~ 120.

有关电视节目内容的。同时，他们读报也较少。^①但另一位研究者检视了 10 个关于电视与阅读成绩的研究，发现没有一个研究表明电视与阅读成绩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说明电视并不一定降低儿童的阅读理解水平。多数研究提出了电视刺激减少了阅读的数量，并影响了青少年的阅读偏好，但是否因为电视刺激导致了儿童喜欢阅读低水平的或轻松的如卡通漫画等，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③

● 电视与智商或学习成绩。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一项研究检验了 100 个小学生电视观看习惯与智商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作者因此说明电视观看的数量与质量不能作为学生学校成就的指标。^④但在另一项实验研究里，研究者将 6 岁儿童分成两组，对一组儿童限制观看电视，对另一组则不限制。6 个星期后的测量发现，限制组儿童的智商分数增加了，同时也增加了阅读时间^⑤。另一个研究也同意这个结论。这项研究在控制了儿童的观看数量、社会阶层、学习习惯

① Morgan, M. "TV Viewing and Reading: Does More Equal Bett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0, 30 (1), p159 ~ 165。

② Neuman, S. B. "Television: Its Effects on Reading and School Achievement, *The Reading Teacher*", 1980, 33 (7), p805。

③ Johannes, W. J. Beentjes and Tom H. A. van Der Voort, "Television and Young People's Reading Behaviour: a Review of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 1989, p51 ~ 77。

④ Childers, P. R. and Ross,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wing TV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3, 66 (7), p317 ~ 319。

⑤ Gadberry, S. Effects of Restricting First - Graders' TV Viewing on Leisure Time Use, IQ Change, and Cognitive Style,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0, 1, p45 ~ 47。

及家庭环境等相关因素后，对 10000 名六年级学生进行了阅读、数学和写作的测试，发现每日看电视超过 6 个小时的学生测验分数特别低。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如此大量地看电视一般都不是个人的习惯，而是家庭的习惯。^①

3. 媒介使用对儿童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在早期研究中，美国佩恩基金会的电影与儿童社会态度的研究已经表明，电影影响了儿童对种族的看法，并可以改变他们的态度。^② 在这类文献中，典型地改变儿童的社会态度的研究是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一些研究发现，由于电视形象充满了刻板印象，使儿童产生了关于现实生活的错误概念，增加了儿童对现实生活理解的困难。^③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电视上，45 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在屏幕上几乎消失了，电视不愿意表现老年人的形象。如果表现的话，男人出现的频度总要比女人多，而且男人总是比女人老得慢。大多数老年妇女是行为古怪的、固执的和不成功的形象。调查结果说明，观看电视较多的儿童比观看电视较少的儿童有更多的对老年人的负面印象。^④ 媒介使用改变儿童的态度与儿童的内容偏好显著相关。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 196 个七年级学生的信息来源、看电视的数量以及电视偏好类型，结果发现，观看更多公共事务节目的儿童表现了较高的对政

① Fetter, M., "Television Viewing and School achiev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4, 349 (2), p104 ~ 108。

② Shearon A. Lowery, Melvin L. De Fleur, 《传播研究的里程碑》，1988，王嵩音译，1993，56 ~ 60 页。

③ Cohen, D. H., "Televis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 *Education Digest*, 1977, p11 ~ 13。

④ Gerbner, G., Gross, L. and Signorielli, N., "Aging with TV: Images of TV drama and Conceptions of Social real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0, 30 (1), p37 ~ 47。

治信息的理解水平。^①

媒介使用对儿童社会行为的影响包括反社会行为和利社会行为两个方面的影响。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主要指侵犯性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影响，其结果分析请参阅第九章。有关利社会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文献说明，如果观察性学习可以解释媒介暴力对儿童侵犯性行为的影响的话，那么，同样也可以解释电视中利社会行为对儿童的行为影响。研究者鲁西顿（J.P. Rushton）将电视中的利社会性分成四类：（1）利他行为（Altruism），包括慷慨、帮助以及合作等；（2）友好行为（friendly behavior）；（3）自我控制行为（self-control behavior），包括抗拒诱惑和接受延迟奖励的精神等；（4）克服害怕行为。鲁西顿分析了有关四种利社会行为的42个实验和实地调查研究，发现结果都非常一致，即观看电视中的利社会行为可以增加儿童的利社会行为。^②

三、我国的媒介与儿童研究

我国儿童与媒介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这10年里，由于电视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普及，电视对儿童行为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10年间论述并不多，约50篇左右，但讨论的问题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1）关于儿童电视内容方面的研究；（2）关于儿童电视使用模式的研究如电视拥有率、电视观看时间和频度；电视内容偏好、观看电视时的同时性活动、电视使用的动机、对电视的认知特点、儿童使用电视的社会性特点、家长的参与与控制等；（3）

^① Rubin, A. "Television in children'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1976, 20 (1), p51 ~ 59.

^② Shearon A. Lowery, Melvin L. DeFleur, 1988,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王嵩音译, 《传播研究的里程碑》 1993, 台湾远流出版社 p396.

电视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包括对儿童健康、心理发展以及社会态度和行为的影响；^① 90 年代以后，由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其他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媒介对儿童现代性的影响”（卜卫：《媒介与儿童的现代化》，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儿童的媒介使用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以及《媒介使用与儿童人格发展的研究》（以上二课题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课题）等。这 10 年间的儿童与媒介研究已不仅局限在电视方面，还包括录音带、印刷媒体以及新媒介技术等。同样在心理学领域，儿童与媒介研究也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献，如专著《儿童与电视》等（张令振著《儿童与电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第二节 理论探讨

一、传播效果理论

本世纪 40 年代以前，社会科学家将传播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宣传。由于战争宣传的成功，使人们建立了媒介效果强大的信念。这种强效果论被后来的研究者概括为“魔弹论”。其心理学假设基础为本能的“刺激—接受者—反应（效果）”模式，即：效果是对特定刺激的特定反应，或者说媒介指向接受者，由此产

^① 卜卫，《我国儿童和电视研究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1992～1993》，359～364 页。

^② 关于传播效果理论探讨的内容，参见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大众传播学诸论》，1989 年，杜力平译，1990 年，新华出版社，161～467 页。

生与媒介信息相一致的结果。“魔弹论”的主要特征是：（1）相对于强大的媒介，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2）不同的接受者会对同样的媒介刺激产生一致的反应；（3）这种反应是相当直接的反应。在这种学说影响下，媒介与儿童研究的关注点是媒介内容。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魔弹论”过于简陋。正如佩恩基金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对不同的儿童可能有不同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不同影响，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假说。他们假设个人在接触媒介信息时，其社会差异和心理差异会起作用，以导致不同的传播效果。这样，对效果的预测要考虑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的学者梅尔文·德弗勒等人将各种假说如“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选择性因素论”等概括为“影响不一论”。关于“影响不一论”研究分为两个互为关联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发现影响接收媒介传播的因素，另一个部分是说明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媒介传播的效果。“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和“社会关系论”属于第一部分，“选择性因素论”属于第二部分。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者探讨了影响信息接受者的社会因素：

“个人差异论”——研究表明，人们在需要、感受习惯、信念、态度、价值观、智力、技能、理性和情感特征等方面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成为影响接受者媒介注意及后来发生的特定行为的重要因素，比如，研究发现，本来就有暴力倾向并对暴力行为持肯定态度的青少年，在看了有关暴力电视以后，容易模仿电视中的暴力行为。但这种情况很难在其他青少年身上发生。

“社会类型论”——社会类型论起源于社会学的社会分化理论。进入 20 世纪以后，新兴工业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城市化、现代化、移民、分工扩大、阶层区分加剧、社会地位流动性增强等等。社会学研究发现，社会分化

产生了独特的行为方式，即相同社会类型的人常常行为相似。社会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亚文化（subculture）也说明了社会类型相同的人有相似的态度、价值观、信念和技能。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处于不同的社会类型中。按照社会类型对人的行为进行统计学比较，研究者发现，处于相同社会类型的人常常行为类似，处于不同社会类型的人的行为常常有较大差异。这一原理对传播理论研究发展有重大意义。从这一理论出发，利用社会实验方法研究传播效果，研究者发现，处于不同社会类型的人，对媒介有不同的兴趣，因而有不同的接触效果。根据种族、社会阶层、城乡、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不同标准可将大众分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型。从个人所处的社会类型中，可推测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特点。如一些研究说明，知识阶层出身的儿童比工人阶层出身的儿童更喜欢接触印刷媒介。

“社会关系论”——社会关系源于一次传播效果研究的偶然发现。1940年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为研究媒介对人的政治性行为的影响，在俄亥俄州伊利县设计了小组连续调查，以了解在选举美国总统时，媒介传播如何影响投票人的行为。在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者发现，社会关系比媒介更经常、更有效的影响个人的选举决策，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人际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两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群集性（gregariousness）等。社会关系变量的发现说明，媒介传播并非在真空中，而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进行的，它的效果是在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下形成的。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还认为，在媒介运动中，大众并不处在平等地位，一般划分出两类人：一类人被称做“意见领袖”，他们占有较优越的传播工具，如收音机、各种报纸、卫星电视等，积极地接收和传播来自媒介的信息和思想，另一类人由于某种信息来源的障碍、理解方面的问题以及个人兴趣等原因，成为“意

见领袖”的追随者。在社会生活中，“意见领袖”扮演了信源和决策指导的特定角色。以后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媒介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个人和社会的特征，也取决于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关系的相互影响。个人并不是与社会相隔离的，媒介传播的讯息及对讯息的看法在家庭成员之间、伙伴或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等的流动，影响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在媒介影响儿童的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对儿童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年龄越小的儿童，越容易依赖成人来确认来自媒介的信息。

我们看到，在“魔弹论”里，刺激与反应之间，即媒介传播与大众之间没有任何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但在“影响不一论”里，所有将人们彼此区分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潜在的干预变量，这些干预变量在刺激（媒介传播）和反应（接受者）中间起着重要作用。如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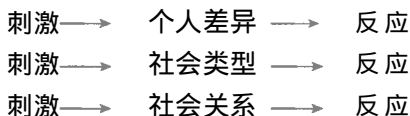


图 1.1 “影响不一论”图解一

个人差异、社会类型、社会关系等代表接受者不同特点的干预变量，通过影响接受者的媒介选择活动影响媒介传播的效果。受众的媒介选择活动一般有三种：选择性注意。一系列干预变量使公众形成了特定的媒介兴趣，当他们面临众多媒介讯息时，他们会注意感兴趣的内容；选择性理解。理解是指公众对外界的信息作出有意义的解释的心理活动。不同背景的信息接收者对同一信息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作出不同解释；选择性记忆。人们容易记住自己感兴趣的和有实际用处的信息。这样，图 1.1 可修改为：